

原创
Creativity 第五辑

吴炫 主编

理论批判与建构的实验

中国式当代个体观的原创性路径

解构正名

浅析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

自身性：中国“孝治天下”的形成与消解

文化的同一性与糅合性

论 19 世纪末与西方美学相遇后的中国美学

全球化与西哲东渐

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

文学真实的存在论根基

论“文道互动”

炼狱之火的灵魂升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创第五辑
Creativity

吴炫 主编

理论批判与建构的实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创.第5辑,理论批判与建构的实验/吴炫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934-5

I. ①原… II. ①吴…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884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原 创(第五辑)

理论批判与建构的实验

吴 炫 主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316,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934-5/C·451

定价 45.00 元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正来	叶秀山	朱立元	刘梦溪
陈 来	张仁寿	胡建森	钱中文
龚鹏程	童庆炳	蒋承勇	曾繁仁
滕守尧			

学术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王纪人	王岳川	王鸿生
王德胜	方克强	邓晓芒	孙绍振
叶舒宪	杜 卫	肖 鹰	吴 光
吴兴明	吴秀明	吴 炫	张节末
张志扬	张建永	陈伯海	陈思和
陈剑澜	陈晓明	陈家琪	陈嘉映
欧阳友权	金健人	周 宪	赵汀阳
赵宪章	郜元宝	夏中义	党圣元
倪梁康	徐 岱	徐 斌	陶东风
曹卫东	盛晓明	崔卫平	董 平
蒋述卓	鉴传今	廖可斌	谭好哲
臧克和			

编委会秘书

王晓华 汤拥华

(代前言)

理论创新是怎样一种努力

吴 炫*

写下这个题目,我一直是颇有些踌躇的。这不仅因为,“原创”这个概念已经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学界泛化为“学术创新”、“材料发现”、“第一次使用西方新方法”等现象,从而消解了“原创”应该是思想理论的“中国当代创造”的意义,使一种学术境界的较高追求,可能降低为每个学者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价值支撑的借口,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宗经思维”已经形成了中国学者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方面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会从传统经典中去“发现中国思想”并误以为这就是原创,从而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理论创造放逐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会以“西方的经典”来代替“中国传统经典”,以“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创新”来代替理论的“中国创造”,把“原创”理解为以西方理论为普世基础来形成“中国特色”,从而把原创理解为“阐释和运用西方理论之个性”,而本质上还是依附于西方原理。更多的学者,则是在西方“传统经典”和“现代经典”之间做“观念选择”,一旦失去了“选择的对象”,便以“文化认同危机”自况,根本不能产生“中国理论创造”的冲动。与此同时,另一些曾经参与过“文化启蒙”的学者,同样会再次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寻找观念依托,以至于像于丹的《论语心得》这样介入媒体的行为,也缺乏对《论语》、《庄子》、《老子》的批判改造的努力,仍然从属于学界流行看法,把“追名逐利”与“自然精神”相对立,倡导“知足常乐”、“越简单就越快乐”、“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用来简单化地面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更不用说网络上的“原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本文系《原创》的原有前言,这里有所增删与润色。

创”网站和“中国原创文学”这样的栏目,也无时无刻不在消解“原创”的“理论创造”之严峻的意味,把一项本来应该让人产生虔诚敬慕的工作廉价化了、搞笑化了。这些,就是理论原创在中国的陌生化的基本境遇。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说,当然是喜欢面对和挑战这样的难题的,而且近20年来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当代理论家,应该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上做建立有自己理论逻辑起点的理论之持续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但要让更多的学者也能够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面对和挑战这样的难题,我还是有些犹豫的。这种犹豫同样来自这样一种学术现象: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真正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性的学者,总还是少数,多数学者在世界观和重大的思想理论上,总还是依附性的、选择性的,并且只能在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上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加上东方文化本没有西方理论那样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理论批判传统,我们不可能要求多数学者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因为放眼展望东亚,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东方现代理论,何必唯独来要求中国?但原创之所以不是一种“学术要求”而是一种“学术倡导”,原创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今天提出来,作为学术界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共同期待,又是因为:迄今为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 and 理论,均主要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如果这些思想理论,或其中一些思想理论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全球范围内的“主体性形象”是有用的,如果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可以经过学术论证和思想推理,能够成为中国现代人的价值规范与人生依托,原创问题或自主创新问题自然在中国就不是那样的迫切。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理论创新很多,但中国学者基本上还没有原创性的、对全球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也还没有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有重大理论贡献给世界,特别是还没有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出不同于西方宗教、也不同于儒家伦理的解决精神和心灵问题的思想方案,并通过影响东方人的现代精神生活来影响世界,这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的自信心,作为素有对天下负责传统的中国,如何能轻言不再承担这样的责任?如何能以东亚诸国“也是如此”为缘由而放弃这种责任?

也许有学者会说,有没有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原创并不是很重要,没有必要去区分中西,只要有道理就可以去遵从。像“民主”、“正义”和“自由”,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可以写一篇长篇论文,这里我只想指出这样几点问题:

一、“民主”、“自由”、“正义”的积极意义,是不是对赞成这样观念的民众没有素质和其他价值观念上的要求?对愿意以“个人权利”换取“发财致富”和“平安即福”,说不出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的依附性的民众,“民主”和“个人主义”真的会产生现代性的意义吗?于是这样的提问就产生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适应解决整个人类心灵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论证靠西方人的理论就能解决我们自己的“满足于世俗化快乐和安逸”之问题?又如何解决学术界普遍的变相抄袭西方理论而不以为耻之病症?如果不能论证,我们今天就没有可以依傍西方理论的理由。

二、我认为笼统地说“西方理论对中国有没有用”是没有意义的。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新潮文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了巴金的《家》,但这样的有用,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去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所以鲁迅、巴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亚洲或本土,中国的“新潮文学”更是走不出中国。如此,依附西方原理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格。所以上述创新也就不能揭示出真正的“中国没有自己创造的现代文化影响世界之问题”。20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的“主体性”也是如此。因为西方的“主体论”难以面对“由理解世界贫困的个体能否形成主体”这样的“中国问题”,其实践功效就会与反封建性的个性解放混同,在“中国究竟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主体”、“中国式主体如何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中国现代主体建设的方法论”等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审美抒情大于原创思考,这样的“主体性”理论在中国再有影响又有什么作用?与此相关的是,认识论哲学进入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可以建立认识论哲学的“谈论方式”,但并不一定有认识论哲学之“质”,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上百年来产生了自己的“认识”,而只是不断地选择西方认识论的各种理论成果,并且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和时代需要所制约,也受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所制约。这是理性的贫乏,当然也是认识论的贫乏。

三、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如果以日本等国家为参照,传统的文化与西方的制度在东方语境中并立,是一种理想的现代化形态,并且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贝尔的“三分天下”理论做支撑。而我之所以对类似观点持保留看法,是因为文化与制度分离的背后必须有价值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在今天的中国是什么?因为同构可以是“二元对立”,但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什么都混在一起”的文化中实施成功。如果日本文化是以“白天的高度谨严认真”与“夜晚的随意放纵”建立起一种

“互不相干”的文化理念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浑然一体的文化国度,“分离”就容易导致“文化碎片”和鲁迅所说的“一盘散沙”,我们要建立“互不相干”的文化,就必须有创造性思考。即便这种“三分天下”在中国某种意义上是可行的,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协调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与西方市场经济状况下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原创性课题,而不可能像奥运会冠军刘子歌那样,赛后说自己常常读《道德经》——如果竞争和成功是一种哲学,成功后又是另一种哲学,这就会导致观念的破碎。因为得不了冠军你就不好说自己常常读《道德经》,得了冠军还是不能用《道德经》去作为自己奋斗的指南。所以,在中国如何尊重“整体性”又“可不限于整体性”,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场的话,必然也不同于贝尔所说的“三分天下”之观念。

关键是,解决上述难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由少数精英去努力,大多数学者拿来使用就行的问题,而是如果没有原创性努力的土壤,如果没有形成尊重原创性努力并在现实学术评价中建立与这种尊重相匹配的评价机制的话,少数人的原创性努力,不是可能会被扼杀,就是不能得到应有的鼓励和重视。尤其是在讲究群体化努力的中国,如果先秦没有百家诸子的努力,后来怎么可能有“儒道互补”的模式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体制的“同一性”结构?而没有夏、商、周的文化积累,孔子的《论语》又怎么可能形成独特的话语形态?如果说集群性的努力氛围是中国式原创的文化土壤,那么,原创在今天就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事者的事情,而不是“少数搞理论创新的人”的事,至少,这是每一个学者都应该有的一种审美意识和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也不是一个仅仅提倡“理论原创”就行的问题,而是要在现实评价机制中建立以“理论原创”为学术最高境界的“共识”并以此来评价学术现实的问题。果真如此,扭转中国理论和学术的“低程度创新”的状况才有可能。

也因为此,对“理论原创”的理解,不是说要求中国理论家必须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的独创,也不是排斥一般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而是希望中国学术界、期刊界都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其一,把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当代原创性思想、理论,作为我们的一个持续的、潜在的审美价值追求,通过个人的努力为之增添一砖一瓦。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每个学者仅满足于介绍和阐发已有的思想和理论,由这样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群体,就很难使得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影响世界的声音;而把发出这样的声音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个“经济强盛、文化虚弱”的中国。而文化

的虚弱又会反过来使经济的强盛处在不稳定的、非持续性发展的“暴发户——贫困户”循环的状态,所以中国文化整体上的自主创新,来自每个人的努力。这就跟没有群众性的足球爱好,靠训练少数足球队员就希望不是偶然而持续地走在世界足坛的前沿是不可能的一样。既然是努力,它就包含和尊重“不太成熟的自己的看法”,而且把“有争议性”看作是有思想原创价值的一个具体砝码。在思想史上,有独创性的思想总是有争议的、有误解性的,因此也是有启示性的,最没有争议的是习见和常识——后者从原创角度看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但是,在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少学者宁愿认同引经据典、材料充分而学术见解大同小异的论文和论著,也不愿意认同自成一说、但还不一定成熟严密的理论新说,就是一种“阻碍理论原创”的土壤的充分说明。

其二,“理论原创”应该是我们看待和分析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状况的一个“价值坐标”,以暴露我们在学术上、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可能存在的各种“中国问题”……我个人以为,有没有这样一个“价值坐标”,是你能不能发现有特性的“中国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依据西方后现代理论说中国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依据传统理论说现代中国有“道德失范”之问题,但你更可以像鲁迅以“虚妄”为价值依托发现中国民族性中的“阿Q”问题一样,说今天的中国问题是“多元”和“失范”均概括不了的。于是,那是个什么问题?就成为你发现“中国式问题”的一个契机——因为“失范”可能意味着回归传统伦理价值中心,而没有现代理性支撑,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多元”。如果中国也很难建立起西方式的现代理性,这个“中国式现代理性”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需要原创性思考的命题,笼统地说要建立“现代理性”是没有用的,也不能简单移用任何现有理性资源。为此,我不是一般提倡“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而是特别提倡“独特的中国问题”,并通过面对这样的问题,去发现原创性理论的生长点。如此,问题性研究和局限性研究,就作为理论原创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我之所以提倡这样的一种努力,首先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在告诉自己: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其实就可以不断体验到这样努力的业绩。虽然每个人的性格、智商和水平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有没有这样的努力,其学术格局和境界肯定会有差异。我个人认为:原创性追求是一个学者毕生应该努力的目标,不管这种努力是否有原创性认同的文化土壤。

其三,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从大学、中学到小学,均应该从“满足于知

识传授、传播和竞赛”向“以批判创造能力激活和穿越知识”的方向转换,才能逐步建立起支撑“中国式理论创新”或“理论原创”的土壤。要完成这样的教育转换,首先需要改造儒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念,建立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批则殆”的新的“学”、“思”、“批”缺一不可的新型“学习观”和“思考观”。即:思考如果满足于“理解”、“消化”性思考,而不能对所学知识进行“批判创造”性思考,那么学的知识不是“死”的,就是“异己”的,知识就没有通过“批判创造”化为自己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就不可能生产新的知识影响已经发生变化的中国现实。中国一些著名学者为什么功底深但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原因概在于从中国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均没有完成上述教育观念的转换。所谓“现代教育”,只不过是借鉴西方学校方式传播西方知识而已,以“博学”为学术最高境界的教育观却没有得到根本的反思和改变。这同时也是中国理论界只是“呼唤原创”但却不知道“如何进行原创”实践的原因。其结果,也就会产生“没有知识积累就没有原创”这一根本不能得到原创经验验证的曲解。因为用这一看法去检验中西方思想家,多半他们都是不合格的,而中国学术积累深厚的学者,同样不能进行理论原创的实践,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学、思、批”一体化的治学观念和教育观念。

其四,加强对现有中西方理论原创资源的研究,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和原创今后重要的工作。这种研究包括:一是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何以可能”的研究,重点梳理诸子百家如何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流派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方法问题,研究诸子百家争鸣中所蕴含的理论批判意味,以满足中国当代思想理论的原创性和多元化诉求。二是研究古今中外有理论原创品格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的原创性经验与方法。既注重探讨可能存在其中的共同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问题,也注重挖掘个性化的理论创新方法和路径问题,弥补现有的以阐释经典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理论观念所造成的空白,为中国当代理论原创性研究提供可供思考的参照。三是注重研究日本对朱子理学的现代批判改造的经验,注意日本现代哲学如何将人道与天道分离、文学脱离伦理和政治功能从而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出可供中国文化现代思想原创参考的经验,突破中国学者孱弱的大国情结对理性品格的遮蔽,虚心学习一切可供进行理论批评和理论创造实践的经验。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者可以共同介入的课题,也是中国学者必须也应该予

以重视的研究课题。可能只有在上述研究比较充分的基础上,理论原创和理论批判的实践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学术积累,从而较为自觉地被更多的学者所重视。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跨所有学科的共同的理论研究命题。我真诚地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朋友参与到这项关系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主体性建立的工作中来。

2013.12.7 于南京

目 录

吴 炫 理论创新是怎样一种努力(代前言) / 1

□ 原创实验

吴 炫 中国式当代个体观的原创性路径 / 3

吴 炫 中国当代个体的复合性责任 / 18

□ 概念辨析

伍晓明 解构正名 / 29

陈家琪 浅析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 / 83

陈天庆 自身性:中国“孝治天下”的形成与消解 / 91

王 洁 荀子“心伪”说重估

——兼论“幽暗意识”问题 / 108

张亦辉 “赋”之新解

——《诗经》修辞探讨 / 133

□ 全球视野

[德]卜松山 文化的同一性与糅合性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与美学 / 151

[德]Heinrich Geiger 论 19 世纪末与西方美学相遇后的中国美学 / 162

张 柯 全球化与西哲东渐 / 172

□ 创新资源

刘启珍 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 / 187

叶淑媛 论维柯思想体系的继承性与原创性 / 194

□ 文学探讨

范永康 文学真实的存在论根基

——后哲学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真实问题之应对 / 209

沙红兵 中国古代“宜”的美学及其现代启示 / 218

刘淮南 论“文道互动” / 237

郭剑敏 “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话语权问题 / 246

□ 穿越运用

文 璘 炼狱之火灵魂升华

——评析文君的散文《海的儿女》 / 259

□ 争鸣选登

翟业军 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 275

陈 冲 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 287



原 | 创 | 实 | 验

中国式当代个体观的原创性路径

吴 炫

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中国现代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继经济持续发展后在文化上如何获得世界尊敬的重要问题。而中国理论界之所以有责任面对这一问题,是因为满足于向世界输出传统文化,就不可能突破鲁迅笔下“先前阔多了”的阿 Q 的形象格局。而要突破这样的格局,只有激发起每个中国人的个体创造力才能完成。因此,个体的创造力如何理解,这种创造展开后中国个体将形成怎样的既区别于传统个体、也区别于西方个体的新型关系,就成为中国当代个体观是否有原创性建构的关键问题。

一、对儒学个体观和西学个体观的双重改造

应该说,把中国文化的现代理解为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理论界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在把中国文化现代化定位在以西方观念为基础做“中国阐释与实践”上,还是定位在以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为基础,融合一些西方元素来寻找“中国特性”上,百年来中国学者一直争议不下。谈到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常常以西方个体本位思想为参照,谈到中国性的时候则以儒家群体本位思想为依托,其理论上的内在矛盾,正是造成中国当代个体观建构缺乏原创性、有机性的原因。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一方面以“中国现代个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为问题出发点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依附群体”的个体,另一方面则必须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通透性”为出发点改造西方“超越群体”的个体,而改造的价值坐标就是既具有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又能够体现个体独立性的“东方式现代个体的审美憧憬”。

之所以需要对儒家个体观进行改造,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已经唤

醒了国人对个人权利、个人欲望、个体观念创造的憧憬，而重视“个人权利”、“个体生命力”和“个体创造力”，正是西方现代性文化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并通过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和主义林立的 20 世纪理论景观体现出来。首先，“个人权利”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法律和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在康德哲学被安排在“正当”、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中被安排在“至善”的位置上。西方以市场经济为体制的现代性之原动力，即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权益和自主性的追求之上，扩展为有平等契约的现代社会。30 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顺应了市场经济这一规定性。因此，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尊重”，就成为中国当代个体应该具有的一种品质。这对儒家“见利思义”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对个人欲望的“节制”态度和宋明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轻视享乐的观念，无疑是观念上的巨大挑战。因为只有改变儒家的“节制欲望”为“尊重欲望”，才能和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对个人欲望实现的重视接轨，这样，我们就必须将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尊重与中国当代个体的欲望膨胀区别开来——后者恰恰不是“尊重欲望”而是“克制——追逐欲望”的逆反所致。其次，晚近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儒家和道家哲学均不推崇“生命强力”而只推崇“生命延续力”的结果，从而导致中国人为生命延续而甘愿受强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奴役而麻木的状态，也使得中国个体为了生存利益常常会放弃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珍视和生命的受尊敬等“生命力的现代思考”。今天，中国面对当今世界强权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的威胁，如果需要具有不怕任何威胁的生命自尊、自信、自强的力量，那就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的“呐喊”、“愤怒”大于“行为”、“行动”的生命虚弱状态，对儒家崇尚伦理性温和的生命哲学和道家崇尚阴性柔弱的生命哲学进行创造性改造，将现代竞争社会所需要的生命强力在中国当代个体结构中予以适当安置。

由于儒家《易传》对“太极图”做了“夫天地者合其德”之解释，这是一种“道”不变而只是对“道”的“理解之变”的解释，便必然导致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所说的“动不失正”的创新观念。“正”即儒家的“仁”、“天道”等世界观、价值观。这样，儒学对个体的“动”之创新的理解，就只能限制在技术、方法、文体、解释、感受、风格的层面，而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承传的、不变的，这就使一部新儒学史，成为变“器”（对道的解释）不变“道”的历史，也使自康有为以后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看似是在批判儒家的“轻利”观念，但由于摆脱不了对西方之“道”的依附，在思维方式上就都是放弃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也都是“宗经”、“征圣”思维的不